

黃應貴《「文明」之路》一書的評論

林開世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要對《「文明」之路》這樣的一套大書，做全面性的解讀與批評，絕對是一件艱鉅的任務。它所牽涉的議題，從資本主義化、國家化、宗教改宗研究、文化變遷，到社會運動、現代性、情緒與感官等等理論上極為複雜的爭議。我相信採取不同立場的學者，可以對這本書所涵蓋的不同章節，作出相當不同的評價。這篇評論稿，想要做的工作，比較屬於補充與延伸，而不是定位與爭議。它主要想提供讀者一些解讀上的方向，希望能讓更多人理解與欣賞。因此這篇評論先用非常簡化的方式來勾劃出這三本書論證的主要意圖與使用的論證形式，並提出我的理解與詮釋，然後，如果可能，再提出一些評估與建議。

從文化理論建構貢獻的角度來看

熟悉黃應貴先生作品的同仁們，應該都知道他在 90 年代開始推動了一系列有關文化基本分類範疇的研討會，並將研討的結果集結成四本書：「人觀、意義與社會」、「空間、力與社會」、「時間、歷史與記憶」與「物與物質文化」。當時這種以康德式的先天範疇作為理論議題的討論，在台灣人類學界引起一陣騷動，刺激了新一代學者的思考，開發了有趣的新議題，但也引來不少的批評（雖然私下的居多）。許多人抱怨這些討論過於抽象，也過於唯心，把人類學研究帶向過分理論化的路徑。而這些基本範疇的設定，過於受西方影響，而且沒有提供完整的框架來解釋為何是選擇這些範疇，而不是其他，如規模、數字能力（scale and numbers）等同樣也是基本的範疇？還有這些基本範疇之間的關係為何？

在三部曲中，我們可以看見黃應貴先生可以透過歷史的過程，將這些範疇的社會脈絡與歷史意義作出比較清楚的交代。一方面回答那些質疑這些範疇的抽象而沒有脈絡性的批評；另一方面，也讓我們見到這些範疇之間的關係不是固定與先驗的

(transcendental)，而是因布農文化的特色而有不同的重要性與不同的發展。這一點在理論上的貢獻相當明確，對那些長久以來，想要克服超越由現代性所帶來的那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分析架構的研究者。這套文化基本範疇的框架，提供了另一套更為尊重並接近被研究者思考概念的分析角度；並因為結合了原本靜態的文化分類與動態的實踐過程，讓時間與 agents 都可以找到位置。這樣的框架雖然仍然建立在理性論的基本假設上，但具有開放比較的可能，並超越心理主義（psychologism）或集體論的化約傾向。我們可以說，經過了十多年的累積與反省，我們終於可以舒服的坐下來泡杯茶，平靜的欣賞黃應貴先生如何應用他對布農人的長期研究成果來呈現這段理論冒險的成果。

然而我還是忍不住要對文化基本分類的作法，表示一點懷疑。黃先生在這本書中主要討論的分類範疇有人觀、時間、空間、物四個，這顯然是受到 Mauss 的整體社會事實概念以及他的後續研究所影響。而在本書中布農族的例證中，人觀佔據了一個主導性的位子，時間與空間雖然沒有那麼具有主導性，卻也因為它們是所有事物都普遍伴隨的面向，所以仍然可以見到它們難以被化約的自主性與影響力。但物的討論就有點不清楚，因為物這個範疇在概念性質上，不同於時空，它具有分類面向，又有實存面向，又有象徵面向，有不同層次的可能意涵。因此，在物的討論時，其實我們仰賴的是布農人觀當中的 *hanitu* 與不同性質的交換來解釋它的作用，物本身是否構成一個自主的討論範疇，反而不是那麼清楚，這樣的結果讓這個理論框架有失衡的現象。如果要克服這個問題，我的感覺應當是提出更進一步抽象的概念，像物質性（materiality），或者實體性（substance），才能釐清楚這個範疇的討論意義。

當然，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如果這些範疇的抽象程度不同，涵蓋的內容性質也不一致，那應當如何確定這些範疇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人類的認知基礎之上？還是一種文化邏輯的構造？這些困難的問題應當是未來想要進一步發展這種框架的學者，必須要釐清的難題。

有關歷史人類學的議題

雖然這本書是以歷史過程來組織與呈現民族誌材料，但是如果細心閱讀，你會發現這不是一種典型的歷史敘事，更不是一種透過安排客觀歷史事件序列來構成的一個整體。三部曲的每一卷，都以很短篇幅交代了外在於東埔或陳有蘭溪區域的歷史脈絡，然

後就進入探討其社會文化秩序如何在不同時期呈現與展開。顯然黃應貴先生更為關注的是當地布農人如何以他們的方式詮釋與實踐他們的社會生活。雖然以國族為主體想像的大歷史存在，但外來的力量：國家、資本主義、與基督宗教，卻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力道與不同的時機進入地方；而不同的力量又被當地人以自己獨特的方式來回應與適應。這裏我想特別指出來的是這本書獨特的貢獻正在於，它沒有假設經濟、政治、宗教與社會（聚落、氏族與家庭）這些範疇都是布農人社會生活的當然面向，反而是需要經過一段曲折與辯證，才逐漸因不同的歷史機緣、不同的行動者、與不同作用速度在他們的文化中成形。這是一段細緻、複雜、精巧的過程，沒有長期的觀察以及參與當地人的主觀與客觀的實踐，是很難掌握到的。這是一種混合了文化結構與實踐過程的歷史書寫，也設下了一個未來處理這種社會文化變遷的高標，我幾乎可以預言將來的台灣學者，不論在田野經驗的長度、深度上，或理論概念的操作廣度，將很難有機會超越這本書。

另外，想要在這本書中看到以布農人為主體來書寫歷史的人，可能會有些失望。因為黃先生雖然給予東埔的人很多空間來抗拒、適應與挪用這些外來的力量，但是他沒有簡單的把這個另類歷史的問題化約為另一種以族群或國族為書寫主體的方式來為布農人建構大寫的歷史。因為他清楚的意識到當你採取了這種方式時，其實你是另一種形式的「殖民化」布農人的歷史。布農人的時空與世界觀的確在殖民的過程中被塑造與轉換，但新的面貌不會是也不應該是以國家或族群作為統合意義的依歸，來複製統治主體的意識型態與書寫的權力機制。他選擇的方式，是透過文化範疇的歷史化來挖掘出那些流動與不明的意識與價值。雖然，在此布農人的主體意識無法以一種單線、發展、認同形成的方式呈現，來滿足當代族群政治的道德判準；但反而會讓我們有更多的空間去想像另外一種歷史書寫主體的可能。而本書的第三卷，正是開創這種可能的嘗試。

書寫策略的分析

這本書是如何將這些複雜的議題整合成一段具有說服力的文化過程呢？這牽涉到我的下一個討論的主題：本書的書寫策略。雖然黃先生曾經構思依照不同的時代精神，個別使用一種文類來表現各個時期的特色，讓文體與理論做進一步的結合。但是因為這牽涉到的問題，遠超過目前主流人類學理論所提供的理解模式，最後還是選擇放棄了。但從友善對待一般讀者的角度來說，我覺得放棄這個嘗試可能反而是一個明智的抉擇。

這三部曲其實結構上相當的完整，第一部的主題是建構起文化範疇（雖然這些範疇相對上仍然是同時限的(synchronic)），並讓我們看見它們在社會生活實踐中的展現。第五章，雖然引入日本殖民政府的政策入侵與布農人的抗拒，但這只是鋪路的工作，我們仍然看見的是相對靜態的傳統如何回應外來的力量，還沒有見到文化如何接納、選擇、吸取、互動的過程。

到了第二卷，這套原本靜態的文化傳統，因為集團移住與水稻耕作所帶來的後果（包括生活規律、儀式與知識各層面），替戰後的國家化、資本主義化、與基督教化鋪下基礎條件。於是一些新的社會文化範疇：政治、經濟、宗教，開始以一種屈折、迂迴的方式獨立出來，成為可以相對自主運作的場域。我們現在面臨的東埔不再是靜態的，混沌的整體，而是一個複雜、有延展性、有層次、有階序的時空構造，具有中心／邊陲，中央／地方，真實／虛幻的世界觀，並且有一個明顯被建構出來的社會與空間中心。

到了第三卷，這個動態的結構，又再度有了一場內捲。地方性的中心逐漸解體，各種力量的作用不再只是具體化在聚落、教堂或集體性的社會組織；而商品化、心理化、個體化以後的人，開始成為另一種以意象和情感為連結的新秩序之承載體。而這同時，大量的情報、人、物與資本卻又像去空間性的符號，四處竄流，形成暫時的節點，又快速的再重組與調整。

這三部曲從混沌靜態的文化結構，到不斷竄動的流，讓我們有一套清楚的圖象掌握這段歷史過程。中間再用現代性的四個幽靈（政治、經濟、宗教、社會）的成形與解體，來論證東埔人是如何透過各種分類界限的界定與跨越，重組與擴張，來面對一百多年來的變局。

這樣的書寫方法，好處是清晰有層次，從簡到繁，又配合一般人們普遍接受的國族歷史論述的框架，是比較容易讓人欣賞的形式。然而，缺點是，基本上書寫的主體位置，仍然是那個客觀外在的觀察者。特別是以東埔社之外的政治經濟構造，為 articulate 地方社會的動力來源，地方的歷史還是依賴「大歷史」來賦予意義，我們仍然在尋找一種南島民族特有的書寫文體，一種布農人意義下的歷史。

然而，黃先生的確有意識的朝向這個方面在努力，對我而言，三部曲中最為具有挑戰性的部分，應當是第三冊的第三、四、五章。在這三章中，作者想透過東埔社的宗教活動，家的形式與實踐，與潛藏的共享意象來具體說明，在當代新自由主義經濟下，當聚落已經被來自經濟、政治、親屬與宗教各個領域的力量拉扯、超越、零碎化之時，住

在此地的東埔布農人的精神與社會生活，呈現出哪些新的動力與趨勢。這裏黃先生走到了一個台灣人類學或社會科學很少涉入的領域，就是人們的情感與意象，以及這些心理現象在當代的重要性。我特別喜歡第四章有關家的八種樣態的書寫方式，這些討論，就像那些他筆下的東埔人，是需要創造力與想像力才能捕捉到那些互動之間、有意識及無意識之間的游離變化；更重要的是，這需要研究者對他所面對的對象，抱持開放、慷慨與同情的心胸，了解他們的困境與痛楚的來源，以及艱難奮鬥與無奈妥協的過程；在冰冷的政經力量的壓擠下，這些人如何創意的持續追尋尊嚴的生活。

書中的這些敘事從來不會流於情緒的渲染，而是在結構性因素與個人的想像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其結果是非常感人的故事與清晰冷靜的分析，既溫馨又殘酷，既特殊又普遍。但即使在焦慮不安那種長長的陰影籠罩下，我們仍然讀到零星爆發的火光，火光中，我們又讀到了希望。這是一段精采的展演，他所開啟的敘事方式，我相信這應當會成為未來討論相似議題時的典範。也讓活生生的民族誌的材料，取得了另一個面向的詮釋空間。

但這幾章的寫作中，有沒有弱點？我覺得也有。在有關歲時祭儀與生命儀禮的討論包括第二卷的第五章與第三卷的第三章，我幾乎被大量的儀式細節淹沒。雖然第三卷第三章後段有關個人化、創新性儀式的出現，與詮釋的多樣化與意象化，這幾個部分的討論非常精彩，也為那種模糊了真實與虛幻的本體論的現象，提供了實質的證據。但是前面段落那些教堂儀式與生命儀禮的討論，不僅高度的重覆，論點也相似，欠缺對不同儀式間的意義結構的掌握，也未能對儀式展演的效用（或失敗）作比較清楚的詮釋。這讓這批材料可能有的相關意象與情緒，以及參與人士的意識與意願難以被掌握。

面臨「當代」

三部曲的研究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這是一本直接面對當代社會文化的著作，一本試圖掌握攸關人類學未來應該會是甚麼面貌的問題。對我來說，在當今全球化與都會化的世界，人類學無可避面必須研究當代，而當代卻是個我們在理論上還沒有找到適當地位的概念，甚至如何定義都非常模糊。過去的人類學其實已經是在研究當代，而且必然是研究當代。只是我們往往把研究者與他者之間的空間距離，轉化為時間的距離（如：現代化理論與演化論），否定了這種互為當代的情境；或者建構出文化的概念，製造出研究者與他者同在一個時空下的理論距離，讓別人的當代離我們遠一點。然而，這些知

識上的策略在當今這種快速與時空擠壓的時代，已經無法再被方便的依靠。人類學家必然要面對所有和我們共享時空與結構的差異，並且要在沒有一種安全的、整體性或統一性的文化或社會（社群 community）概念存在的情況下，試圖去理解差異成立的條件與假設。

然而，既然文化、族群等概念已經無法作為可靠的差異性的框架，那就像其他的社會科學，我們必然要面對與理解當代，那人類學還剩甚麼？還有甚麼特點？我們與別的研究者與觀察者有何不同？

對我來說，我們與其他社會科學最大的不同在於我們應該試著去拒絕現代性以及現代性所帶來的那些本體論看法，用 Bruno Latour 的說法，我們就是那群看破現代性的被建構性，而採用那種同時具備「真實、社會與敘事性」能力的民族誌來研究當代社會的人。我們不再依賴現代性所賴以維繫的分析範疇（像政治，經濟，宗教與社會），作為研究的界限與分類，而是把這些範疇的存在，倒過來當成是必須解釋的問題。這是人類學可能的獨特與激進之處。

進一步說，介入到當代的生活，我們與社會上各種行動者、觀察者、規劃者（企業家，管理人才，工程師，都市計畫師，醫師）又有何不同？就像昔日被我們有意排除在田野工作情境的傳教士、殖民地官員、以及旅行家，其實人類學家與他們的差距比我們想像的更近。如果有差別，那是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有意的控制速度，不時的加速、逗留與停頓，然後試圖去詮釋不同的速率所產生的差距空間與意義。我們是那種介在兩群研究者之間的研究者，一方是那些快速的製造現場感的新聞工作者與旅行者，另一方則是那些等事情都已經冷卻甚至停止，才利用殘餘的文本再製意義的歷史學家。人類學家面臨當代，就是要進入那個流動與不定的現實，然後針對你研究的對象設計出精巧的概念裝置或物質安排，來尋找不同速率的觀察與反思的狀態。

文明之路三部曲可以說是一本當代的研究，尤其在第三卷，這本書勇敢地把台灣社會當代的這種流動、混雜、不確定的情境寫入其中，並嘗試理解與定位。它採取的減速策略是先建構出文化的基本範疇，然後利用時間所製造出來的脈絡，來將混雜不定的當代定位。這是一種從過去以來，一直可以有效地生產出豐富成果的理論傳統，雖然可能相對上是一種比較保守的作法，也很容易掉入歷史主義的陷阱中。我覺得至少還有幾種作法可以開闢出不同的可能性。例如：（1）拉長社會關係連結網絡，多個地點同步觀察，更能讓我們清楚知道，流動的方向、速度與力道；（2）辨識出流動的重要節點，與各種資本的聚斂點，探究它們的為何與如何減速與定位。

之所以會提出這些可能性，是因為懷疑人類學看待資本主義的方式，特別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相關經驗研究，似乎都太過自我邊緣化。我們太容易相信 Lyotard 等人所提的後現代知識狀態，或者蓬勃的文化產業所製造出來的多樣、多元，好像我們都已經活在一個時空擠壓、超越國界的流動世界。但是有沒有可能，這些琳瑯滿目的現象都只是網路末端的亂碼？可能在金融資本集中的中心，其實那些運作的方式，都還是最緩慢、最老派的家族關係與私下交情，那些類似裙帶與血統的戲碼繼續在暗處中進行。我們需要有人類學家去研究各種文化、金融、社會、情報資本集中的中心，並了解他們是如何在空間上再地域化（re-territorization）。單單靠對柬埔寨這種被國家與市場邊緣化的文化研究，可能難以理解資本主義成功擴張的秘密。

另一種可能性出路？

回到黃先生在當初學術的起點想要回答的問題，透過對非西方、小規模社會的研究，我們可不可能尋找到一種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活方式？如果你認真的讀過三部曲全書，答案其實是蠻悲觀的，因為我們看到從第二階段開始，柬埔寨人的平權的人觀就被個人主義式的心態所壓蓋過，空間上整條陳有蘭溪兩岸的部落持續被國家行政力量邊緣化，而時間觀也被教堂與市場雙重力量所規範與商品化，最後殘餘的只是一些在家戶與個人生活圈中情緒與情感的連結。當然，即使在如此困難的情境中，我們還是能看到柬埔寨人，持續透過他們的創意與活力，尋求生活的尊嚴與希望。但這種地方性的適應與實驗，距離提供一種不同於資本主義，可能的另類秩序，仍然是遙遠難企的。

這樣沉重的結論，固然是當地親身觀察的人類學家，瞭解原住民所處的不平等經濟政治結構下的困境，然後針對現實的評估後所呈現的結果。但這種外在／內在與中心／邊陲的二元敘事形式（雖然中間提出了各種辯證），可能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資本主義的成功，絕對不只是因為那些政經結構與制度的力量，它更是改造、重新定義我們的價值與評估價值的方式。當我們使用有權力者安排與建構出來的那種經濟社會秩序的結構，來作為我們分析所謂「邊緣文化」的框架時，我們難以避免會得到悲觀的結論。因為我們的分類與概念往往不自覺的就會重製一套堅固的政治經濟相對於柔弱的在地文化，這種不平等關係；也選擇了資本主義制度所認定的重要力量，來做為分析的切入點。換句話說，我以為要論述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其他可能出路的工作，不應該使用那些以現代性自居的社會科學所發展出來的範疇，而是需要建構符合在地文化脈動的文類與風

格，來呈現不同的價值形成與策略如何在不同地方運作。在此，我不是建議單靠論述就能夠提出另一種出路。但是，如果無法在現實世界中找出一些魔術與想像的可能，那我們是不可能改變既有的秩序。也是在這裡，我們應當感謝黃先生在本書的第三卷幫我們跨出了一步，雖然我們距離這個可能還很遙遠，但期待這本書能刺激更多學者能認真的面對這個攸關當代倫理的課題。